

现代国外经济学 论文选

第四辑



商务印书馆



2 019 8749 4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 四 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 年 · 北京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四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259

1982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11 千

印数 1—7,000 册

印张 4 3/4

定价: 0.63 元

出版说明

《国富论》问世已经二百多年了。这部对西欧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有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名著，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命运如何？对它的评价是否有所变化？对斯密理论的研究的现状怎样？这些都是我国从事古典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人所深切关注的问题。为满足学术界在这方面的要求，我们从西方报刊所发表的纪念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的论文中，选译了十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供作参考。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对斯密理论的研究曾经沉寂了好几十年，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却发生了变化。当前在西方不仅对斯密理论的研究，而且对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出现了热潮。用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这种现象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自六十年代末期起，西方世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战后二十多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和繁荣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出现的是社会动荡、大量失业以及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局面。这种情况是正统的凯恩斯理论所解释不了的，也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所无法对付的，西方经济学界终于出现了自三十年代以来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这种局面，使得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转而求救于古典经济学，想从对它的研究中找到足以“医治”资本主义各种疑难病症的药方。他们逐渐认识到，仅有凯恩斯理论和瓦尔拉、马歇尔的经济理论是不够的，必须用古典派经济理论作为重要补充，即要“复兴”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

“复兴”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他们主要是循着以下三种途径来进行的。一是抛弃洛桑学派、剑桥学派的说教，直接使凯恩斯经济学与古典派经济学相“沟通”。这是新剑桥学派目前的做法。二是抛弃凯恩斯经济学的一套国家调节经济的主张，强调经济自由主义，使传统庸俗经济学关于市场供求均衡的概念同古典派经济学中关于自由放任的传统主张保持一致，强调利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地配置社会的经济资源。这是当前新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对待古典派经济学的基本态度，也是他们在“复兴”古典派经济学时所强调的主要方面。三是既不摒弃凯恩斯经济学，又不摒弃瓦尔拉、马歇尔的学说，而是在二者并存的基础上再加上古典派经济学关于供给和资源配置的论述，试图“综合”成为一个“新”的体系。这是“新古典综合派”中一些人的看法。

“复兴”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重新研究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尤其是在研究李嘉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斯密以其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而受到重视。西方多数学者至今仍认为斯密是古典派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是经济学之父。对斯密的研究在1976年的《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前后达到了高潮。曾经举办过几次国际性的讨论会议，发表过大量研究论文，英国还出版了新的亚当·斯密全集。在当前西方出现古典派经济学的“复兴”的潮流中，《国富论》是各流派共同重视的研究对象。其所以如此，除了因为它是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著作外，也还由于他的内容庞杂，有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因而为各派学者各取所需提供了方便条件。资产阶级学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搜集在本书中的欧文·索伯尔的这篇文章就写道：“它（《国富论》）是那样广泛地包含着人类在历史、伦理、经济和政治上所表现的社会行为的所有方面，以致不同的和对立的思想学派都能够与

GDC30/16

斯密认同。”这一论断是与实际情况符合的。读者将从本书所刊载的不同观点的论文中得到证实。

经济理论研究，包括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在内，无论何时，总是与当时所遇到的社会经济问题相关联的；同时也必然受到当时整个经济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西方对《国富论》的研究便是如此。它既不同于十九世纪历史学派纯学术式的探讨，也与本世纪前几十年的研究有很大区别。它有其特点。第一，与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策上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有关。讨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今天是否仍有现实意义和有多大的现实意义。鉴于西方从三十年代以来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导致市场机制削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今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恢复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义是可取的，斯密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是值得重视的。另一方面，即使是货币主义者的弗里德曼，在猛烈抨击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的同时，也还是认为对斯密所提倡的完全的自由主义应持慎重态度。类似这些关于斯密的议论，显然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实际政策问题密切相关。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对于斯密理论的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来看待《国富论》。例如，他们认为《国富论》第一篇是现代的所谓静态分析，即对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分析；第二篇含有较多的动态分析，即对资本性质和资本积累进行分析；第三篇继续进行动态分析，即根据历史资料进行分析，而非抽象论证。同时，对《国富论》研究的重点也已经转移，不再以微观的静态的价值论为中心；而着重研究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式发展理论，西方学者认为这是斯密的主要理论贡献之一。此外，随着制度经济学的抬头，有些学者主张把重点放在剖析《国富论》中的制度主义因素上，他们特别重视《国富论》后三篇的研究，甚至认为，

古典派的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复兴”主要表现在重视斯密著作的制度因素上。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论其派别何属，其基本理论都是庸俗经济学，再加上他们在研究古典学派作家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他们的研究“成果”自然包含有很大的谬误和偏见。对此我们应该持慎重的分析批判态度。但就经济学说史料而言，他们中某些人对文献的整理和考证的成果却是不容抹煞的，某些个别论题的研究对我们也不能说毫无启发。例如本书中论文的几位著名作者（弗里德曼、罗尔、斯蒂格勒）都一致认为，亚当·斯密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分析了市场机制；其中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斯蒂格勒教授甚至把这一理论誉为《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这种评价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他们通过总结西方几十年来国家过分干预经济的教训，提出应当重视斯密二百年前关于市场机制的论述的意见，不能认为对我们毫无参考价值。

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丰富的，其科学因素早经马克思肯定，并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想通过加强对古典派经济学的研究来解决当前的危机，从根本上讲，这是徒劳的，毫无希望的。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多种疑难病症在于其制度本身。但是对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深入研究古典经济学派的某些基本理论，对于帮助搞清楚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些经济关系及其规律，从而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应该说不是没有益处的。

1981年6月

目 录

纪念《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1776—1976)

.....埃里克·罗尔 (3)	
亚当·斯密二百周年纪念..... T.W.哈奇逊 (16)	
向亚当·斯密致敬! 罗伯特·海尔布伦纳 (32)	
斯密教授的成功与失败..... 乔治·斯蒂格勒 (44)	
亚当·斯密与美国革命者..... 威廉·格兰普 (61)	
亚当·斯密是怎样的一个制度主义者? 欧文·索贝尔 (76)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都市与农村..... 吉恩·E.莫迈 (101)	
亚当·斯密与当今的联系..... 米尔顿·弗里德曼 (120)	
斯密的价值论与李嘉图的价值论在两个 方面的比较..... 布兰尼斯拉夫·赛斯克思 (133)	
亚当·斯密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鲁道维特·考赛克 (142)	

纪念《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 (1776—1976)

埃里克·罗尔^①

按照本性，人们对全部人类历史，也许特别是思想史，可能有两种看法。有些人认为，历史是一个没有任何间断的连续的发展，是天衣无缝的。另一些人认为，历史是一系列表面上看来不连贯的许许多多事件；是一连串使人们思想出现飞跃的伟大人物的偶然出现。对一些人来说，历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广大下层劳动者以辛勤的劳动用一块一块石头垒起来的建筑。对另一些人来说，历史的发展就等同于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等同于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等同于托勒密、牛顿和爱因斯坦。

就政治经济学这门现代学科的起源而言，第一种观点肯定能被大量的证据所证实。事实就是这样，与亚当·斯密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以及它所伴随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早期阶段，在《国富论》出版前的差不多一百年间就已经在形成中了。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领域里，诺思曾猛烈抨击了残存的重商主义思想和限制贸易法规的束缚；洛克和休谟在一般哲学领域里和政治哲学领域里，曾经是说明自由主义精神的样板，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后来在法国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在亚当·斯密以前的一个世纪，配第就仔细地研究过价值问题；并且早在

^① 埃里克·罗尔在学术界和政府界颇享盛名，现任S.G.沃伯格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曾广泛地写过关于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著作。

1776 年以前法国的重农主义者就差不多已经相当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首尾连贯的关于财富循环的体系。

然而，如果人们看不到十八世纪最后 25 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大分水岭，那大概必定是特别缺乏想象力，甚至是感觉迟钝了。1775 年，姆斯·瓦特（一位不可思议的脾气不好的天才）和老于世故的实业家马修·博尔顿合作，用工厂方法制造出了蒸汽机；虽然它曾被认为是虚构的，但作为科学研究和企业之间象征性的合作——而且是在那个有决定意义的干事业的时代里——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好的合作了。14 年后，法国革命带来了促进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力量，改造了社会，这些力量直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在这期间有奇妙的 1776 年。

这是何等重要的一年呵！那年的 3 月 9 日，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出版了，当时不象现在这样，为了迎接一部未来畅销书的出版，搞文人午餐会或其他活动来为其大肆宣扬。几个月后（传说是 7 月 4 日，不过学者们对准确的日期还有争论）在费城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乍看起来，把一位苏格兰伦理学家的立论严谨而内容复杂的两大卷四开本著作和托马斯·杰斐逊的简短而有力的战斗号令联系在一起，可能显得奇特。但在它们之间的确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庆祝《国富论》发表二百周年的时候，把它们连在一起是非常恰当的。

这种联系在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亚当·斯密专门论述跟美洲和东印度的殖民地贸易，尤其是论述对这种贸易的垄断的那些部分。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些段落：“因此，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象重商主义所有其他卑劣有害的手段一样，阻抑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业，但主要是殖民地的工业，不但没有一点增加，反而减少那为着本国利益而建立的工业。”或者，“在一个国家里，给一个人数不多的阶层带来一点利益，它（垄断）会损害那个国家所有其他阶

层的利益，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一切人的利益。”在提倡美洲殖民地自愿脱离英国时，他说：“这样，殖民地和母国，就象好朋友的分离，几乎为近来的不和所消灭的殖民地对母国的自然感情，就会很快地恢复。”至少对于亚当·斯密，杰斐逊的抱怨（英国人“对正义和骨肉同胞的呼声充耳不闻”）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更主要的是，鼓舞亚当·斯密的基本精神，正是新共和国的建立所依靠的精神。这两者都诉诸“自然秩序”或“自然法则”。独立宣言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与斯密在其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所持的看法是很接近的；独立宣言的原则是“所有人生而平等”，这也与斯密的下述观点接近，即：“在不同的人中，天资的差别实际上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小得多……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搬运工人……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天生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习惯、风俗和教育所造成的。”

在这些问题上，即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最一般的权利和义务上，亚当·斯密是很符合时代精神的。如同从古希腊的斯多葛哲学家到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主义哲学流派所认为的那样，他认为，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是受自然力的活动支配的，这些自然力自发地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模式；而未受到严重阻碍的这些自然力的作用，将会自动地最充分地促进每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相一致。目前，我们应当更仔细地研究这个学说的确切意义，研究这个学说如何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要研究从这个学说中得出的结论与当代的各种问题有什么关系。但是，首先应简单介绍一下亚当·斯密其人，介绍一下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以及他在经济政策演变中的作用。

亚当·斯密其人

亚当·斯密发表其巨著时，年为53岁。到那时止，这位苏格

兰军法检查官的儿子，曾经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受过教育；曾任过13年教授，在任教期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曾作为布克里公爵的私人教师在法国旅行了两年，从布克里公爵那里领取优厚的年金。《国富论》出版后不久，他成为海关税务司长，一直任职到1790年逝世时止。他是第一个真正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从他以后，经济学的发展才日益成为学术工作的成果。在他任教授的13年期间，他的讲稿，部分地以与《国富论》紧密相关的《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在许多方面包含了《国富论》的哲学基础）为中介，显然是最终成为他后来的著作的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斯密的早期传记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以为这些讲稿遗失了。幸而，事情不是这样，因为1895年埃德温·坎南受人委托审查了，并在1896年出版了斯密的讲演的笔记——《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些讲演包含的许多内容在《国富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详尽阐述。1958年洛西恩教授发现了，并在五年后出版了一套斯密的更早的讲稿《修辞学和纯文学》，尽管这些讲稿与斯密的经济思想几乎无关，但却充分表明了斯密的爱好和才智的范围。

斯密的兴趣和才智之广泛是惊人的。我们从杜格尔德·斯图尔特那里已经知道，他对古代和近代的语言及文学很有研究；他和当时学者名流广泛结交。他的这些个性可以从《修辞学》讲稿中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十八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对于他来说，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与他在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中的深思有内在联系的，也确实这些思索的重要部分（斯密在晚年可能不象当时的其他思想家那样对自然科学那么感兴趣，但也应该指出，据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时，特别喜爱数学和自然哲学）。《国富论》问世二百年来，经济学的许多内容不仅变得更抽象，而且还常常是高度数学化的，的确不象斯密的著作那么容易被一般读者所接受，这也许是经济

学成熟的标志吧！但在从事经济科学的人中，现在并没有多少人具有这门科学创立人那样广博的爱好和知识，这也许有更深刻的意义，但确实是令人遗憾的。

斯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亚当·斯密对狭义经济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已尽人皆知，因此比较简单扼要地重述一下就可以了。首先是他在总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上的贡献。在亚当·斯密以前，没有人达到同斯密一样的系统而连贯的分析水平，斯密的分析尽管经常从实际生活中引用实例，但在许多地方是高度抽象的。经济学第一次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自觉的和自信的科学；虽然它和社会哲学的关系仍然显而易见，但它现在已长大成人并准备过自己的生活。《国富论》这部著作构思巧妙，旁证博引，在论述艰深的理论问题时，辅以尽人皆知的比喻，从这儿可以看出，作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精通经济学，难怪书一出版，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就对经济政策产生了影响。

虽然后来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李嘉图的《原理》，古典体系的另一支柱）没有全部仿效这本书，但这本书的结构对后来所有的经济学著作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篇的内容主要是现在的所谓静态分析，即对生产、交换和分析的分析。第二篇包含比较多的动态分析，即对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积累进行的分析。第三篇继续进行动态分析，并且主要是根据历史的、描述性的资料进行分析，而不是抽象论证。第四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有名的毁灭性的批判。它不仅抨击重商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个别政策，而且抨击整个重商主义制度，其猛烈程度迄今还没有被谁超过；虽然，在新近主张“自由贸易”的文献中，对重商主义攻击所使用的语言和引用的例证是较为现代的。第五篇论述了当时

的所谓的“公共部门”，详细分析了公共支出和公共支出所依赖的资金来源，即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收入。这一篇的内容，也许，甚至比从理论上论述交换性质和市场性质的那些章节或者比那些抨击重商主义的章节，更能明确地说明亚当·斯密关于经济政策的理论，而国家干预的反对者也能在这里为自己的观点找到很多弹药。

不过，从纯经济理论后来的发展来看，斯密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国富论》的前几篇里。我在这里要说，斯密对经济学所作的创造性贡献并不是价值理论，因为在斯密以前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论述价值理论，斯密的很多分析也有些混乱，最清楚地阐述这一“古典”理论的人是李嘉图。人们也可能会争辩说（我也倾向于同意这种意见）：根据最近二百年间这门学科的历史，价值在经济理论的核心中占据这么久的统治地位，并不都是有益的；而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中心的转移是有利的。不过应当记住，斯密之所以非常注重分析价值，是因为他想把创造价值的劳动、提高劳动效率（从而创造出更多价值）的分工以及即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又确定劳动分工范围的市场，当作经济思想的中心。这确实是他的最伟大的成就；而其价值理论的缺陷，相比之下是无足道的。

与价值理论有联系的另一伟大成就，就是强调财富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储备。引言的第一句话就定了一个与早期著作家或当时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不同的调子：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不妨顺便指出，正如埃德温·坎南所认为的那样，接下去的一句话的含义是：衡量国民福利的标准应该是平均数即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数，而不是合计数。虽然过了大约 150 年后有关国民收入的分析 and 衡量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才趋于完善，但衡量国民生产总值的崭新

方法在斯密的著作里就已萌芽了。

不管怎样,《国富论》中的许多观点是崭新的,并且已被事实证明对经济学具有永久性价值。例如,在纯利益的理论中和在非竞争集团的学说中,所包含的对工资和工资差别的分析,尽管现在看来不免很粗浅,但仍然是这门学科被公认的理论的一部分。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国富论》对关税以及国际和国内贸易中的限制性手段进行了详细的批判性的论述,后来的分析虽然使这些论述更全面了,但并没有取代这些论述。《国富论》还提出了关于征税的著名的四条原则,即均等、确定、便利和经济。这些原则将得到每一个现代纳税人的有力赞同,如果人们希望有原则的话。

不管《国富论》对纯经济理论有什么样的贡献,它的划时代的性质在于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这点上,如同后来的一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韦斯利·米切尔所认为的那样,亚当·斯密是“现代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他的书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最重要的是由于它对当时“那些正在消亡的文明的原则”的批判,并制定了“正在出现的文明的原则”。现在,我就来谈这个问题。

政策处方

亚当·斯密的社会哲学的基本性质是非常简单的。他从自己的社会哲学出发,通过他的经济分析,提出了他的政策处方。整个中世纪社会以及早期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部分,是以一整套错综复杂的规章制度为基础的。该套制度不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方面,都往往过于细致地规定了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重商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商业要么受到国家的直接控制,要么受到行会和特许公司等代表国家利益机构的控制。斯密撰写《国富论》时,这种制度已处在迅速崩溃的过程中。因为以新技术发明为基础的新

的生产方式向人们表明，旧的经济关系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力。蒸汽机、动力织机以及珍妮纺纱机的出现，要求具有更广泛、更自由和更灵活的社会、经济（最终还有政治）结构，如果人们想充分利用这些新机器的潜力的话。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虽然一开始并不是谈的这一点，但他就重商主义制度下国家对工商业活动的严密控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过卓越的批判。批判的顶峰是充分揭示了殖民制度对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双重危害及其政治后果。没过多久，“独立宣言”就明显不过的显露了这种政治后果。但是，揭露个别限制性手段以及国家管制的整个制度的愚蠢还是不够的。斯密是一个哲学家；而且当时的整个时代精神是倾向于作出全面解释和“建立体系”。因此，对重商主义进行批判，必须建立在合理地阐述另一不同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上，而这又必须建立在能够为一般人所接受、并符合一般人的知性和普遍愿望的社会哲学之上。所以毫不奇怪，斯密首先分析市场经济的优点，分析与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哲学，然后才批判重商主义。

斯密像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一样，对自然秩序深信不疑。实质上，这表示他只相信自然的东西，而不相信人为的东西。他认为，假如不加阻碍地听任自然秩序自由发展，那么这种秩序要不了多久时间就会表明，它比人们通过法律建立的任何秩序都要优越。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就已经详细阐述了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这些动机的相互制约作用便产生了自然秩序。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是：与怜悯之心（即爱他人）相抵的自利心，渴望自由，注重礼节，劳动的习惯以及交换倾向。如果这些力量不受干预地自由表现出来，每个人就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应用到经济领域，“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